

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中国化

张剑伟¹, 赵凯荣²

(1. 湛江师范学院 法政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48; 2.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张剑伟(1963-), 男, 河南信阳人, 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哲学原理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赵凯荣(1962-), 男, 内蒙古呼和浩特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哲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目前重要的一个学术研究方向。但是, 现在流行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解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具体实践的提法, 只是一种实践化和工具化, 因而只是一种外化和表面化, 而问题的实质却在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化, 否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根本不可能真正解决。

[关键词] 意识形态; 中国精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1-0005-07

在世界历史上, 很少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那样长期以来一直被一种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持久影响。过去关于中国封建统治何以如此漫长一直争议不断, 但很少有人从这种意识形态中去找寻原因, 反倒是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多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汤因比教授认为, 这是中华民族即便历经内忧外患而终不可以使之裂解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甚至是世界未来避免分裂的真正的智慧。

然而, 在帝国主义对华战争中, 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却经受了一场严峻考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这场战争充满了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和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1] (第710页), 并预言: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 不顺时势, 安于现状, 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 (第716页)。不过, 马克思也谈到这个民族的希望, 那就是它的觉醒: “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 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1] (第691页) 这种“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的觉醒, 在其现实性上, 就是今天被人们普遍谈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不过, 随着苏俄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由于这事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运, 所以不能不予以特别的注意。

一、马克思主义苏东化为何失败

苏俄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 一度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不过没有多少严肃的学者会真正认同此点。结论是明摆着的: 与其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 还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苏俄化或东欧化的某种失败, 只是马克思主义在苏俄或东欧的失败。关于如何在苏俄马克思主义化, 列宁与第二国际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过争论, 既与伯恩斯坦代表的“右派”争论过, 也与考茨基代表的“中派”争论过, 甚至同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等代表的“左派”争论过。最为有趣的是, 当列宁在俄国取得十月

革命的伟大胜利时,几乎没有一个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相反,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尽管他们之间分歧甚重,但在这一点上却几乎一致),这是违反、甚至是严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这里实际涉及了两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化。一种涉及到俄国的原本的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化;一种则涉及到俄国的已经非原本的、非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化。我们不能说前者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化(事实上,人们一般都不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只是在相反的、反对的意义上谈论它),而后者,正是现在一般人们津津乐道的。这种理解有一个一般的模式,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

但是,只要我们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样的理解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这就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中反复强调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具体实践。而根据这种理解: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且只有惟一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就像物理学作为物理学是一种惟一科学的物理学一样。而所谓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就像物理学的俄国化一样,只是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俄国,只是将物理学应用于俄国。也就是说,这种马克思主义化,只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化,只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俄国的具体实践。只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们眼下谈论最多的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问题,究其实质,正是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模式,正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实践化的模式。

相比之下,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则根本不同,即根本不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俄国化模式,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俄国理论化。如此,则不能不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理论形态,如前面所言,当列宁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只能在四个发达国家率先共同实现的思想发展为社会主义可能在落后国家率先实现且可能单独一国率先实现时,这已经不是或不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实践化,而是改变了原有的理论形态,成为原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而这种理论形态的改变,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同苏联东欧本民族意识形态的结合。任何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那样一个民族,必有其使之成为自身的强大的意识形态传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才在 1922 年亲自领导了一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大辩论,对波格丹诺夫等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追求“纯无产阶级文化”的思想进行了尖锐批判^[2](第 366 页)。

由此可见,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苏东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种马克思主义苏东化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化。这种马克思主义苏俄化,恰恰表明了这还只是外化,还不是内化,不是真正的化。因为在这种框架下,马克思主义的苏俄化、东欧化,仍然是两张皮,苏东是苏东,而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即这种化只是马克思主义在苏东,还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苏俄化或东欧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这不能不给我们沉痛的警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不能只是这种本土化的方式、或实践化模式,马克思主义不能只是靠强权外在地存在,它必须要内在化在民族的血液、精神和灵魂中,成为真正本土的意识形态。否则,要么马上失败,要么只能靠强权寿终正寝。但意识形态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只是意识形态,它只能活在意识形态中并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活着,任何一种让意识形态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活着并用强权维系的活着的做法,只能最终导致失败。在这点上葛兰西确有独到之处,虽然他的问题域在西方国家,但对东方各民族也仍然有重大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应该汲取他的政治智慧(尽管他并不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任务是将马克思主义融入各民族的意识形态,因此,文化领导权甚至比政治领导权更为重要³(第 178-180 页)。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

现在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存在上述理解上的偏差。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引用毛泽东的一个经典说法:“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4](第 667 页)。

于是,在中国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化的理解。关于这种理解的不妥,我们前面已做了详述。现在我们要说的只是,这决非毛泽东本人的意愿,相反,正是在那段引言中,毛泽东谈到:“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4](第667页)同样在那段引言中,毛泽东将此进一步具体化:“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4](第667页)

在这段引言中,毛泽东将他的意思表达得再清楚不过:(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西化”。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极为广泛的所指,甚至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中国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化,即不是“全盘西化”,而是有选择有放弃的化,这个有选择有放弃是指:选择精华(至于何谓精华,完全视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定),放弃糟粕(至于何谓糟粕,也完全视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定)。(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一定是中国自己的消化物。在这个意义上,化即为消化,也就是变成中国民族的文化,只不过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关于此者,毛泽东还有更具体说明:“‘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4](第798页)由此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可以这样化吗?这就涉及到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一个说明。

对马克思来说,问题也是十分清楚的。所谓的意识形态及其诸形式,并不具有唯心主义思想家所推崇的那种显赫地位,相反,任何意识形态及诸形式,全部意义只在以各自的形式反映现实事物。从这个意义说,不管思想家如何宣扬自己的思想的超越性和独立性,但对马克思来说,它们终究不过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存在的反映。英国哲学家罗素十分认同这个观点,并承认这影响了他的《西方哲学史》的写作。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就不单单是马克思主义那么简单,它应该被理解成资本主义相对成熟时期或相对成熟的资本主义的产物(如历史发展到英国阶段的大工业的产物,而马克思后来一直居住在英国)。所以恩格斯承认,就是没有他们,别人也照样会创立马克思主义,他甚至提到了工人狄慈根在不知道马克思甚至不知道黑格尔的情况下,也有了这方面的发现。总之,马克思主义也罢,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也罢,只能植根于最先进的经济发展基础上,且本身必然是先进的意识形态。所以恩格斯才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同情”^[5](第258页)。

比照中国的情况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全部意识形态完全是植根于封建社会的土壤上,这怎么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呢?事实上,斯大林就是这样看待中国问题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有过明确的怀疑:山沟里怎么可能会出现马克思主义?这也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贯主张。但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一些西方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列宁坚持主张,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摧毁旧的政治制度——资本家的政治堡垒,谁也不能从资本主义走到社会主义。然而,毛泽东有时则暗示,中国可以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从‘新民主主义’一直走到‘社会主义’,这一论点与斯大林——铁托的决裂以前东欧方面所主张的论点并无不同。”^[6](第67页)

毛泽东的依据是什么?这样做是否合理?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理解毛泽东在此问题上与马克思等人的异同性。很显然,在这一问题上,他们所依据的尺度根本不同。在这方面,马克思等人强调的是经济形态对意识形态的决定性,而毛泽东则根本不同,他所依据的正是意识形态特有的相对独立性。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毛泽东,他们都是对的。对马克思来说,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只能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可以产生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时才会产生。而对毛泽东来说,尽管中国广大乡村不具备产生这种阶级意识的基础,但是,毕竟在这之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经在别的国家和地区产生

了。因此,对中国来说,它已经不是一个产生的问题,而是已经产生,问题只在于如何在中国扎根。说到这一点,不能不提到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些信件。那些信件,一般被认为主要是讲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正是在这些信件中,恩格斯强调说,经济落后的国家完全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处于领先地位,他特别提到了德国,认为德国虽然在经济上落后,但在思想上却一直是第一小提琴。毛泽东当然也就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抱同样乐观的态度和信念。

事实上,毛泽东很早就认为,中国之落后,主要在意识形态(这与马克思对中国的判断完全吻合),“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循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7](第1版)因此,在毛泽东看来,所谓的救国重在改变民质,而改变民质,则重在思想。这就势必导致“西化”的结局,正如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表述中明确陈述的那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思想贯穿了毛泽东一生,他一生都把思想改造看成是几乎差不多最重要的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中国免于亡国的论断并不一定正确。罗素在1922年写的《中国问题》已经明确表述,亡国的问题是一个问题,但并不是真正的最为困难的问题。资本主义同样也可以救亡。真正困难的问题在于:中国能否在保存自己的、在汤因比看来甚至是今天世界统一绝对的需要的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前提下不亡国。罗素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挽救中国于危亡。但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这里存在一个二律背反:要么,中国人只能带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并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而被列强消灭;要么,中国人放弃它的意识形态而战胜他的敌人。林语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直言:“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否拯救旧文化,而是旧文化能否拯救我们。我们在遭受外界侵略时只有保存自身,才谈得上保存自己的旧文化。”为此他倾向于现代化,“事实上,我们愿意保护自己的旧文化,而我们的旧文化却不可能保护我们。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但这样一来,也就必然意味着,西方送给中国的“战争艺术”,“中国不得不全部接纳下来。”与罗素一样(与马克思相反),他也认为,“中国要适应今日野蛮而好战的世界,毫无疑问是个艰难的历程。这无论对她和她的邻邦还是对她本身,都不是吉兆。”^[8](第317-320页)

好在事情并没有发生,多亏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问题不是是否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而是:是否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保持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救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罗素没有看到还存在第三条路——中国有可能在保持自己优秀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免于亡国,而这只有诉诸马克思主义才能实现。而罗素担心的事反而发生在了日本的身上,作为一个东方国家,今天日本在文化上已经全面倒向了西方。在这点上,罗素没有看错。“虽说日本文化在明治维新之前源于中国,直到今天,日本的书写仍然采用汉字;日本的佛教也是从中国传入;忠孝是日本的伦理基础,儒家的这两种美德是与其他古老的中国文化一块进口来的。”^[9](第93-94页)但不同的是,“日本受西方影响很大,应视为西方在远东的弟子,所以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它的白人老师也应负有责任。”^[9](第5页)罗素依此在1922年前就预言:“从长远看,日本人不是成为远东霸主就是走下坡路。”^[9](第5页)西化当然可以、也确实救了日本,然而日本就此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从日本的身上我们便可窥见中国西化的影子。

造成这种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意识形态导致了一个偏重于物和技术的结局。在受过欧洲多国哲学熏陶的辜鸿铭看来,这几乎可以说是与中国意识形态的最大差异:“东西文明的差别就由此而生。欧洲人没有真正的文明,因为真正的文明的标志是有正确的人生哲学,但欧洲人没有。”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辜鸿铭认为,有还是有的。“为了寻找欧洲的人生之道,欧洲学者提出了多种主张,如斯宾塞、卢梭等等。他们的主张从某个方面看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是不完善的,不是那种真理性的东西。”^[10](第209-210页)相反,“在中国,把真正的人生哲学称为‘道’,‘道’的内容,就是教人怎样才能正当地生活,人怎样才能过上人的生活。”^[10](第209页)

反观马克思主义,既然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保持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使中国人既免于亡国又

能击败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强权,也就意味着,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具有某种内在的契合。事实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最后也是力求达到通过人、为了人、作为人而向人本身的复归。这不正是辜鸿铭所说的“教人怎样才能过上人的生活”的中国意识形态吗?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同这种看法。他也认为,中国文明同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地位”(毛泽东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信),这“半壁地位”,说的显然就是这个。但是,为什么同样的价值追求,中国意识形态却只能导致失败,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却能导致成功呢?原因并不复杂,没有人会说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是好的意识形态,但同样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中国意识形态之要求非牺牲乃至巨大牺牲难以达到,因此在具体操守上存在极大困难。看看孔子的教诲吧:“菲饮食而致教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再如“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再如“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再如“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真是太难了。所以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正因为太难了,才不必追求那善本身和那操守后面善的真正动机,那操守本身就是善本身。

中国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是,要求人们去做一个人在其现实性上几乎很难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典型的要求便是,要人们去舍利取义。与之相反,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却使人的疯狂逐利行为合法化,并力图使之永恒化。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则主张,经济利益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所以资本主义主张的逐利行为是有其合理性的,甚至比孔子那样的道德说教更现实甚至更进步,而孔子要求人们不要追逐利益的主张则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同占统治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不认为这具有终结意义,相反,认为它们只具有阶段性意义,并最终被真正人的关系所取代。就这个意义说,资本主义只是人的解放的必然前提。也就是说,孔子的那些非常好的主张,只有在经过一个疯狂逐利后的经济解放阶段后形成的物的依赖关系的解体后才有现实可能。这并不是说的共产主义的物质无限丰富(根据经济学的稀缺性,这永远是不可能的),而是说,物质生产及分配肯定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使得人们有可能摆脱物的依赖。比如,中国人现在虽然不能说粮食产量无限大,但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不为几斗米折腰”的要求也就自然不再是苛求,“有耻且格”的格局也只有在那时才能真正成为现实。所以,毛泽东说得完全正确,不是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不对,而是一直未能找到一条实现的道路:“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但是,“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4] (第1360,1359页)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不可忽视的两个重要问题

正因为接受并奉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较接受并奉行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远为困难,所以,再提出更加的或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这样的任务,对于有几千年封建传统底蕴的中国人来说,绝对是苛求,事实上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王明曾多次出版过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基本上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相当苛刻近乎无理的要求。

说其近乎无理,是说这根本不可能办到。说到此,金岳霖先生有一个精彩的说法可以附会。金先生说:“传入外国哲学与进口外国商品不完全一样。例如在上个世纪,英国人曾经惊呼德国唯心论侵入英国,他们说‘莱茵河流进了泰晤士河。’但是英国人尽管惶恐,他们的泰晤士河并没有因此变成一条莱茵河;英国的黑格尔主义虽然承认来自外国,是外国引起的,却分明是英国哲学,尽管它的英国色彩不像洛克哲学和休谟哲学那样鲜明。”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最终一定“分明是”中国哲学。金先生这样谈到了佛学的中国化。“释家在中国,无论如何,在早期是受到中国思想影响的,实际上有一段时期披上了道家的法衣,道家可以说成了传播佛法的主要代理人。但是,释家有一种倔强性格抵制了道家的操纵,因此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传统中国哲学,在基本特色方面却不是与固有的传统中国哲学没有区别

的。”同样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最终分明会是中国哲学,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基本特色方面却不是与固有的传统中国哲学没有区别的”。所以,我在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章中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中国,我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我们也都在搞中国哲学。这是一偏正结构,它有两个向度:一个是对中国意识形态来说的,方向是把中国意识形态转化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如此就要改变部分中国意识形态而提升自己的意识形态;另一个是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的,方向是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溶入中国意识形态,如此就要改变部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迎合中国意识形态。

如果我们借用“体”、“用”这两个词来说的话(体用实际是不可分的,体只能是用体的体,用只能是体的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就是马体中用;中国意识形态之马克思主义化则是中体马用。这样做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确定化之主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化的主体是中国意识形态。如此,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说的就是马体中用,和其真正要表达的中体马用正好相反,说的恰恰是中国意识形态之马克思主义化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中国化。但它们有其统一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就是为了中国意识形态之马克思主义化。

那种主张更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要求,只是强调了马体中用,只是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忽略了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国情,因此,必然会表现为超出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苛求。这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动不动就板起面孔教训人,动不动就道德说教,动不动就对其它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动不动就要对其它不同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决不宽容,也决不妥协。对这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人们一般形象地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老太婆”。这一说法马上让人联想到一个呆板、生硬、絮絮叨叨的老母亲的形象。我认为,再没有比此种要求别人做很难做到的事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更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了。母亲这样做是为了教育自己的孩子,当然没有错。但母亲不能超出现实可能性提出过分要求。必须考虑到现实的可能性,必须考虑特定历史阶段人性可能接受的程度。比如说,大公无私,公而忘私,这当然是高境界,社会如此,当然正气浩然。但至少在现阶段,有谁会愿意生活在这种社会中呢?中国素有礼义之邦的美称,但鲁迅却偏说,封建礼教的软刀子可以杀人,救救孩子。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推行会碰到中国意识形态推行一样的困难。这种困难,早在 2000 多年前孔子已经不知多少次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到了。孔子推行的主张,不仅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些就是从今天的发展水平看,也是较难实现的。所以,也就难怪有老百姓劝孔子的学生不要跟着他做这种根本无法成功的事:“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而且,不仅孔子的学生子路这么认为,连老百姓也是这样看的,也就很好理解这样的事:“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竟成了孔子的身份证和名片,可见其难。所以辜鸿铭说:“欧洲没有这样的东西。欧洲有的是基督教。基督教叫人们怎样去做一个好人。而孔子学说则教人怎样成为一个良好的国民,努力做一个好人当然是好事……比如登山拜神即可成为一个好人,而想作为一个良民,则须知‘五伦’之道,这却是一件相当难的事。”^[19](第 209-210 页)

当然,我们警惕这种倾向,并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高标准严要求;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自己的高意识形态标准。不过必须注意一个界限,那就是对普通人,应予以足够的宽容,而对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则予以高意识形态的要求,以带动社会进步。

与之相比,另外一个倾向也必须特别注意。这便是,只片面强调中国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化,只强调中体马用,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实践化和工具化(这是较为流行的看法,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可能会导致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先进意识形态过于迁就落后民族的传统文化,结果反而可能被落后的民族文化的意识形态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出壳,并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败坏马克思主义。这种迁就和借壳作祟的事情,我们在已经解体的东欧和苏联的

社会主义中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现在, 仍然有许多西方学者认为,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中掺杂有许多沙皇专制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成份。这个观点当然难免偏颇, 但却给我们以深深的警示: 毕竟中国是一个比俄国有着更为漫长的封建历史的国度, 尽力避免中国传统中某些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形式或面目出现, 并努力实现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优秀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先进意识形态的大融合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参 考 文 献]

[1]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 白嗣宏. 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 [G]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3] [意] 葛兰西. 狱中札记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5]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 [美]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 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 [R]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7] 毛泽东.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N] . 湘江评论, 1919-07-14.
[8] 林语堂. 中国人 [M]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9] [英] 罗 素. 中国问题 [M] . 秦 悦,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6.
[10] 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 [M] . 海口: 海口出版社, 1996.
[11]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责任编辑 严 真)

On Marxist Ideological Sinicization

ZHANG Jianwei, ZHAO Kairong

(1. School of Politics & Law, Zhanjiang Normal College, Zhanjiang 524048 Guangdong, China;
2.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ZHANG Jianwei (1963-),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s & Law, Zhanjiang Normal College, majoring in Marxst philosophy; ZHAO Kairong (1962-), male, Doctor,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st philosophy.

Abstract: Marxist philosophic Sinicization was researched as an emphasis in China lately. But now popular understanding for Marxist philosophic Sinicization that thought Marxist philosophic Sinicization was namely practice of Marxist philosophic in China is exterior and skin-deep. The question essence lies in Marxist ideological Sinicization, so we first must solve the question, or we cannot solve the ques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ic Sinicization.

Key words: ideology; Psyche Sinicization; Marxist philosophic Sinicization